

《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研究

蒋雨衡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0000

DOI:10.61369/HASS.2025070004

摘要：18世纪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首次将中国戏剧（元杂剧《赵氏孤儿》）译介到欧洲，开启了中西戏剧交流的滥觞。本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外部分析与文本内部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其译介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考察其跨文化译介的具体策略，探究其跨时空译介在西方产生的深远影响。研究认为，《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不仅是一次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事件，更是一个由特定翻译动机、翻译策略与启蒙思潮合力塑造的跨文化形象建构过程；不仅是一次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协商与文学再创造，其意义超越了其译介本身，深刻融入18世纪中西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交流史之中。

关键词：《中华帝国全志》；《赵氏孤儿》；中国戏剧；译介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ramatic Literature in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Jiang Yuheng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 In the 18th-century, Du Halde's compilation,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was the first work to introduce and translate a Chinese play (the Yuan dynasty Zaju play, *The Orphan of Zhao*) into Europe,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Sino-Western exchange in drama. This study take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ramatic literature in Du Halde's work as its subject. By combining external and internal textual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ranslation, examines it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investigates its profound and trans-temporal impact in the West.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dramatic literature in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was not merely a cross-cultural literary dissemination event, but a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image construction, shaped by the combined forces of specific translation motivations, strategi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 And it was not just a linguistic transfer, but a process of cultural negotiation and literary recreation. Its significance extends beyond the translation itself and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history of 18th-century Sino-Western literary,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s.

Keywords : *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he Orphan of Zhao*; Chinese drama; translation

引言

《中华帝国全志》^[1]（全称《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由杜赫德汇集耶稣会士的手稿、著述及译作编辑而成，于1735年首刊于法国，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科技、文学与文化，被誉为西方的“中国知识百科全书”，在中学西传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全书共分四卷本，有关中国文学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卷，其中第三卷收录了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译自《元人杂剧百种》中的元人纪君祥所作元杂剧《赵氏孤儿》^[2]，使其成为第一部被完整译介到西方的中国戏剧文学作品，不仅为欧洲读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文学样本，更对欧洲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伏尔泰的戏剧改编，到欧洲文人的竞相模仿与讨论，这部来自东方的“孤儿”故事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跨文化旅游，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戏剧创作与中国想象。

本研究以《中华帝国全志》为核心文本，采用文本内部分析与文本外部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戏剧译介活动进行深入考察，剖析此次译介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其具体的译介策略，并评估其在欧洲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其在塑造欧洲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想象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一、译介背景：“中国热”与道德论争的双重驱动

18世纪的欧洲，正值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一股强劲的“中国热”席卷了思想界与艺术界。在耶稣会士的描述下，遥远的中国成为一个由哲学王统治、以道德伦理治国的理想邦国，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欧洲现实、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启蒙时代的“中国热”与文学的期待视域

18世纪的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异域文明，特别是对中华文明的强烈好奇与向往。经过耶稣会士的介绍与美化，中国在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笔下，成了一个与腐朽、专制的欧洲旧制度形成鲜明对比的“乌托邦”^[3]。中国的科举制度被视作贤能政治的典范，儒家伦理被赞誉为一种理性道德哲学。

在这种普遍的“中国想象”下，欧洲学界对来自中国的文本，特别是能够印证这种理性与道德理想的文学作品，抱有极大的期待。《赵氏孤儿》^[4]所讲述的关于忠诚与信义的道德故事，恰好契合这种期待。剧中程婴、公孙杵臼等义士为了信守承诺，不惜牺牲个人亲情甚至生命，这种强烈的道德情操和自我牺牲精神，被启蒙思想家视为儒家道德的集中体现，足以媲美古希腊罗马悲剧中的英雄主义。因此，“中国热”为《赵氏孤儿》的接受铺平了道路，使其不仅被当作一部富有异国情调的戏剧，而是被视为一个承载着深刻道德内涵的哲学寓言。

（二）道德论争与戏剧的道德教化角色

18世纪的法国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戏剧作用的讨论，其主要争议点是：戏剧到底是伤风败俗还是能弘扬道德^[5]。受启蒙思想影响，耶稣会士重视个体凭良知进行的道德决策，因而一直把戏剧当作教育手段，并上演大量具有道德教化色彩的戏剧^[6]。

《赵氏孤儿》这部出自中国并且弘扬道德的戏剧十分契合耶稣会士在这一辩论中的观点。此外，该剧在推广“忠义”思想的同时，没有融入任何迷信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卷入“礼仪之争”的耶稣会士建立积极中国形象并获取支持。通过译介《赵氏孤儿》，耶稣会意图向欧洲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其核心道德内涵，从而提高其在欧洲知识界的地位，证实其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二、译介策略：删曲留白，以文代戏的归化与重构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本，并非对纪君祥原作逐字逐句

的忠实复制，而是一种文化转码与文体重构。其核心策略可概括为“删曲留白，以文代戏”，这种典型的归化翻译旨在消除文化障碍，使译本符合18世纪欧洲戏剧的审美规范。

（一）“删曲留白”：从舞台艺术到案头阅读剧本

元杂剧是一种“曲、科、白”紧密结合的综合性舞台艺术。“曲”即曲词，是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的手段，具有文学性与音乐性；“白”是宾白，即叙事和对话；“科”是舞台动作和表情的提示。三者有机融合，构成了元杂剧独特的审美范式。然而，18世纪的欧洲读者对这种唱、念、做、打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是极其陌生的。在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下，戏剧严格遵循“三一律”（时间、地点、情节的统一），悲剧与喜剧界限分明，诗体的韵文对白是主流，而剧中穿插大量唱词被认为是破坏戏剧严肃性与连贯性的做法。

马若瑟意识到这一审美鸿沟，在寄给友人的信中曾解释为何不翻译曲词：“（曲词）充满了对欧洲人来说毫无意义的典故和比喻，对于了解剧情并非必需。”^[7]于是将剧中绝大部分曲词（“曲”）予以删除，只保留了宾白（“白”）和必要的舞台动作提示（“科”）。这一“删曲留白”的策略将元杂剧从一种包含歌唱和韵文的复合文体，简化为一种散文对话文体，更接近于当时欧洲流行的散文剧。原作中通过曲词营造的抒情意境、诗性美感和音乐节奏感几乎完全丧失。例如，在程婴决定牺牲亲子时，原作中有大段悲壮激昂的唱词，以抒发人物内心的痛苦与舍生取义的决绝。在译本中，被简化为平实的对话，虽然保留了主要情节，但情感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极大削弱。

此外，原作是为舞台演出而创作的“场上之曲”，译本则变成了一部更适合在书斋里阅读的案头剧本。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流畅地理解故事情节，却无法体验其作为东方戏剧的原始魅力。

（二）情节与人物的重塑：迎合欧洲道德观与戏剧逻辑

马若瑟在情节铺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也进行了调整，以使其更符合欧洲读者的逻辑和道德观念。译本强化道德冲突的普世性，着重突出了剧中“忠”与“奸”、“义”与“不义”的二元对立，将程婴等人的行为塑造为一种超越文化背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壮举，并转化为关于人性与美德的寓言。

原作中人物的行为受到儒家伦理纲常的影响。例如，剧中韩厥自刎一方面是为了救孤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全其“义”，避免在屠岸贾面前受辱。在译本中，这些行为更多地被解释为普遍的人道主义同情和对正义的追求，使其更易为没有相关文化背景

的欧洲读者所理解。

综上所述，马若瑟的翻译策略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文化过滤与文体重建。他以牺牲原作的文体与审美为代价，将一个中国故事移植到了欧洲的文化土壤中，使其能够被当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三、译介影响：从伏尔泰的改编到欧洲文坛的文化回响

《赵氏孤儿》的译本一经问世，便迅速在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伏尔泰的改编为高潮，并辐射至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形成了一场围绕“中国孤儿”的跨国文学运动。

（一）经典案例：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启蒙思想的注入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对《中华帝国全志》中所描绘的中国理性文明推崇备至，并认识到《赵氏孤儿》故事中蕴含的巨大戏剧潜力。1755年，他改编的五幕悲剧《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0]在巴黎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大获成功。然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并非马若瑟译本的简单戏剧化，而是一次彻底的“启蒙化”再创作。

伏尔泰将故事背景从春秋时期的晋国，移植到了13世纪蒙古征服南宋时期。剧中，屠岸贾更换为征服者成吉思汗。原剧中的“忠奸斗争”主题也因此被置换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伏尔泰试图探讨高度发达的中华道德文明能否感化野蛮的军事征服者。伏尔泰改变了原剧的角色和人物关系，孤儿成为前朝皇帝的遗孤，并引入了爱情线。这种情节设置，使得戏剧冲突不再仅仅围绕孤儿的生死，而是交织了忠君、爱情与道德抉择的复杂情感，更符合欧洲观众的欣赏习惯。

此外，原剧结局是孤儿长大后手刃仇人，实现了血腥的复仇。这在伏尔泰看来是“野蛮”的。他将结局改为成吉思汗最终被臧提夫妇坚贞不屈的道德情操所感化，赦免了所有人并收孤儿为义子，还宣布要学习中国法律与文明来治理国家。这个“大团圆”结局宣传了伏尔泰的核心思想，即道德力量终将战胜暴力，理性与文明是征服人心的最终武器。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利用一个中国故事框架表达了反对暴政、颂扬理性、倡导宽容的启蒙主义理想。这部剧的成功，极大提升了中国戏剧在欧洲的地位，并使“中国孤儿”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文学母题。

（二）跨国传播：欧洲文坛的文化回响

《赵氏孤儿》的影响力并未止步于法国。马若瑟的译本和伏尔泰的改编本被迅速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各国引发了不同的回响。

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在1741年根据《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译本^[11]，创作了《中国孤儿：一出历史

悲剧》（*The Chinese Orphan: An Historical Tragedy*）^[10]。此剧虽然未得实际上演，却是欧洲第一部改编之作。1759年，英国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的《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11]在伦敦上演，更强调情节的曲折和舞台的奇观效果，虽然也受到伏尔泰的影响，但在细节和主题上有所不同。

意大利著名歌剧脚本作家皮埃特罗·梅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于1752年以《赵氏孤儿》为蓝本创作了歌剧脚本《中国英雄》（*L'eroe cinese*），将其改造为巴洛克正歌剧（opera seria）形式，充满了咏叹调和宣叙调，主题聚焦帝王的宽宏大量与英雄的美德，以迎合宫廷庆典需求。

在德国，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其戏剧评论著作《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对伏尔泰的改编提出批评，认为其为了迎合法国戏剧常规而牺牲了原作的朴素力量。歌德也曾创作一部名为《埃尔佩诺尔》（*Elpenor*）的戏剧，虽未完成，但残篇显示他试图将该复仇故事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相结合，进行更深层次的哲学探讨。

这一系列的改编与讨论表明，《赵氏孤儿》已经超越了一部具体作品的范畴，成为18世纪欧洲文坛的一个共享文化资源。每一位改编者都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戏剧规范和个人思想，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和塑造。在此过程中，中国戏曲的原始面貌虽然变得模糊，但其核心的道德故事却被不断地“欧洲化”，并被整合进启蒙运动关于人性、道德与政治的宏大叙事之中。

（三）塑造中国想象：从文学文本到文化符号

《中华帝国全志》对《赵氏孤儿》的译介及其后续影响，深刻地塑造了18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华文明的认知与想象。

首先，《赵氏孤儿》的译介确立了中国文学“道德高尚”的形象。原剧中，程婴的牺牲精神被视为儒家道德的缩影，这强化了欧洲人眼中“道德的中国”形象。同时也带来了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戏剧与欧洲戏剧一样，以情节和对话为中心。马若瑟“删曲留白、以文代戏”的归化与重构策略，使得中国戏曲独特的音乐性和写意性特征在欧洲长期不为人知。最后，伏尔泰等人成功的改编，使得“中国”在欧洲文学中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符号，代表着古老的智慧、崇高的道德，以及一个可以用来反思和批判欧洲自身的“他者”镜像。

因此，《赵氏孤儿》的西传史，既是一部中国戏剧文学旅行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想象的建构史，展示了异质文化在相遇、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通过译介被不断地误读、利用和重塑，最终成为自身文化肌理一部分的复杂动态过程。

四、结论

《中华帝国全志》作为18世纪欧洲汉学的重要汇编，通过收录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开启了中国戏剧文学向西方的译介之门。从译介背景看，此次译介活动是18世纪欧洲的“中国

热”与道德论争的双重驱动。从译介策略看，马若瑟采取的“删曲留白，以文代戏”的归化策略，通过牺牲原作的综合艺术形态，剥离其对欧洲观众而言过于“异质”的歌唱部分，是一种文化协商，也是中国戏剧能够在欧洲迅速传播的关键所在。从译介影响看，《赵氏孤儿》的译介展示了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变形”与“再生”。在此过程中，《赵氏孤儿》从一部中国戏剧，升华为一个承载着欧洲人对道德、政治和异域想象的文化符

号。以《中华帝国全志》为载体的中国戏剧文学译介，是一场复杂的文化建构活动，开启了中西戏剧交流的先河。这一译介过程不仅丰富了欧洲启蒙戏剧的想象空间，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彰显了中国戏剧文学在全球视野下的跨文化适应力。该译介案例分析可为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Du Halde,J.B.*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ris:P.G.Lemercier,1735.
- [2]张明月.《中华帝国全志》研究 [M].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7.
- [3]周宁 . 天朝遥远 :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M].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臧懋循 [明]. 元曲选 [M]. 上海 : 中华书局 ,1958.
- [5]鲁进 , 魏明德 . 舞在桥上——跨文化相遇与对话 [C].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6]谭渊 , 张小燕 . 礼仪之争与《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典籍与文学的译介 [J]. 中国翻译 ,2021(04):49-56.
- [7]马若瑟 , 杜磊 . 马若瑟论法译《赵氏孤儿》 [J]. 国际汉学译丛 ,2022(00):189-205.
- [8]范希衡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 [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9]Du Halde,J.B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R.Brooks trans.London:Printed by and for John Watt,1736.
- [10]Hatchett,W. *The Chinese Orphan:An Historical Tragedy.Alter'd from A 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ragedy,in Du Halde's History of China.Interspers'd with Songs*.London:Biblio Bazaar,2010.
- [11]Murphy,A. *The Orphan of China,a Tragedy,as It Is Performed at the Theatre-Royal,in Drury-Lane*.London:Printed for P.Vaillant,1772.